



說苑讀本 新譯

羅少卿 注
周鳳五 校
古籍今注新譯叢書
三民書局印行

羅少卿 注譯
周鳳五 校閱

新 說
苑
讀 本

三民書局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新譯說苑讀本 / 羅少卿注譯;周鳳五校閱. — 二版一
刷. — 臺北市: 三民, 2009
面; 公分. — (古籍今注新譯叢書)

ISBN 978-957-14-5223-4 (平裝)

1. 說苑 2. 注釋

122.41

98013386

◎ 新譯說苑讀本

注譯者 羅少卿

校閱者 周鳳五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02)25006600

郵撥帳號 0009998-5

門市部 (復北店)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1996年8月

二版一刷 2009年8月

編號 S 03108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 不准侵害

ISBN 978-957-14-5223-4 (平裝)

<http://www.sanmin.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

劉振強

人類歷史發展，每至偏執一端，往而不返的關頭，總有一股新興的反本運動繼起，要求回顧過往的源頭，從中汲取新生的創造力量。孔子所謂的述而不作，溫故知新，以及西方文藝復興所強調的再生精神，都體現了創造源頭這股日新不竭的力量。古典之所以重要，古籍之所以不可不讀，正在這層尋本與啟示的意義上。處於現代世界而倡言讀古書，並不是迷信傳統，更不是故步自封；而是當我們愈懂得聆聽來自根源的聲音，我們就愈懂得如何向歷史追問，也就愈能夠清醒正對當世的苦厄。要擴大心量，冥契古今心靈，會通宇宙精神，不能不由學會讀古書這一層根本的工夫做起。

基於這樣的想法，本局自草創以來，即懷著注譯傳統重要典籍的理想，由第一部的四書做起，希望藉由文字障礙的掃除，幫助有心的讀者，打開禁錮於古老話語中的豐沛寶藏。我們工作的原則是「兼取諸家，直注明解」。一方面熔鑄眾說，擇善而從；一方面也力求明白可喻，達到學術普及化的要求。叢書自陸續出刊以來，頗受各界的喜愛，使我們得到很大的鼓勵，也有信心繼續推

廣這項工作。隨著海峽兩岸的交流，我們注譯的成員，也由臺灣各大學的教授，擴及大陸各有專長的學者。陣容的充實，使我們有更多的資源，整理更多樣化的古籍。兼採經、史、子、集四部的要典，重拾對通才器識的重視，將是我們進一步工作的目標。

古籍的注譯，固然是一件繁難的工作，但其實也只是整個工作的開端而已，最後的完成與意義的賦予，全賴讀者的閱讀與自得自證。我們期望這項工作能有助於為世界文化的未來匯流，注入一股源頭活水；也希望各界博雅君子不吝指正，讓我們的步伐能夠更堅穩地走下去。

導 讀

本文從五方面介紹《說苑》：

一、《說苑》的編者

《說苑》的編者劉向，原名更生，漢成帝即位以後，他貶官復出，改名向，字子政，後世便以此名流傳。

劉向是西漢王室的宗親。他的四世祖劉交是漢高祖劉邦同父異母的弟弟，好讀書，多才藝，輔佐劉邦平定天下，劉邦做皇帝後，封他為楚元王。劉向的祖父名辟彊，字少卿，愛好《詩經》，善於作文，曾官拜光祿大夫，擔任長樂衛尉。其父名德，字路叔，修黃老之術，有智略，漢宣帝時，封陽城侯。這既是一個貴族世家，也是一個書香世家。

劉向自幼聰穎，十二歲時，由其父保任，到皇宮做輦郎，陪侍皇帝的車駕。成人以後，擢為諫大夫，常在君王面前應對詔命，進獻辭賦。

漢宣帝繼承其祖父漢武帝衣鉢，晚年迷信神仙方術。劉向之父劉德曾在淮南審案時，得到過有關祕籍，藏於家中。劉向幼時讀過這些書，為投宣帝所好，便把這些書獻了出來。書中有如何冶煉黃金的記載，宣帝讀後，便下令照書中的方法冶煉，結果花費了許多資財卻一無所獲。宣帝大為惱怒，將劉向關

導 讀

1

進監獄，判處死刑。劉向的哥哥花去一半家產為劉向贖罪，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劉向出獄後，正逢朝廷立《穀梁》、《春秋》博士，因其博學多才，宣帝徵他授《穀梁》，在皇家圖書館石渠閣講論五經，官職又恢復為諫大夫。

漢宣帝死，其子即位，是為漢元帝。劉向與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侍中金敞四人同心輔政，一時頗受尊任。但因反對外戚、宦官弄權，反遭讒陷，結果弄得蕭望之免官，周堪、劉向下獄。這是劉向第二次坐牢，後來雖獲赦免，終遭貶斥，遂廢居十年。

直到漢成帝即位，弄權的宦官石顯等人伏誅，劉向才又一次被起用，先後任中郎領護三輔都水、光祿大夫、中壘校尉等職。但此時朝中的大權，仍然操持在外戚手中，所不同者，元帝時是母黨許氏專政，成帝時是母黨王氏擅權。漢成帝大舅王鳳當時任大將軍，他兄弟七人皆為列侯，控制朝中一切權力。劉向對此十分不滿，多次上書勸成帝遏制王氏勢力，他說：「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此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勸諫的態度坦直，言語激切，成帝知其精忠，不怪罪於他，但也始終未奪王氏之權。

河平三年（西元前二六年），成帝詔令劉向校理圖書，當時劉向已經五十一歲，此後二十年，直到七十二歲去世為止，他一直從事此項工作。關於劉向校書，《漢書·藝文志》是這樣記載的：「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待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先秦書籍，多亡於秦火，至漢武帝時，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對圖書作過一次整理。劉向校書，即在此次校書的基礎上進行，但作用卻遠比前次的大。

劉向校書是有組織、有計畫，按統一步驟和體例進行的。他領導一班人，廣泛搜集資料，精心比勘編排，使散亂的殘篇斷簡，變成了完整固定的書籍形式，便於觀覽和流傳。可以這樣說，沒有劉向校書，

就沒有我們今天能見到的先秦古籍。

另外，劉向在校書的同時，還對所校各書作者的生平、著作的大旨、學術的源流加以考訂，把考訂的結果寫成書論，稱為「敘錄」，上奏皇帝，這便是《漢書·藝文志》所說的「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這些敘錄除了供皇帝觀覽外還有兩種用途，一是置於編成的各書之首，作這些書的序言，二是總彙成冊，名曰《別錄》，「別錄」的含義，就是另行抄錄。《別錄》二十卷，早已失傳。作為序言的「敘錄」，極少數還隨原書保存下來，現在能見到的有《戰國策敘錄》、《晏子敘錄》、《孫卿新書敘錄》、《山海經敘錄》等。從殘存的敘錄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劉向等人校書所花費的巨大心血和他們一絲不苟的治學態度，還可以窺見這些文章的重要學術價值，清人章學誠稱劉向的敘錄具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校讎通義》卷二）的作用，是不為過的。

劉向對我國文化事業創造性的貢獻是首創圖書分類法。這一成果在他死後由他兒子劉歆寫成《七略》上奏皇帝。《七略》除總論群書的《輯略》外，另有《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把所有的圖書分為六類。《七略》後來也亡佚了，班固編《漢書·藝文志》採用這一方法對圖書加以分類，從中可以窺見《七略》概貌。劉向父子的圖書分類法，為後世的圖書分類提供了重要借鑑。

劉向還是著名的經學家和文學家，平生著述頗豐，據清人嚴可均統計，有《尚書洪範五行傳論》二十卷、《五經通義》九卷、《五經要義》五卷、《世說》二卷、《別錄》二十卷、《列女傳》十五卷、《列仙傳》三卷、《新序》三十卷、《說苑》二十卷、集六卷。集中有辭賦三十三篇。這些著述多已亡佚，明人輯有《劉中壘集》。流傳至今的，除了由他編輯的《新序》、《說苑》、《列女傳》等書外，還有一些奏疏之類政治論文及前面提到的殘存敘錄，辭賦中僅留下《九嘆》、《請雨華山賦》，清人嚴可均把它們輯錄在《全漢文》中。

二、《說苑》的編纂情況

這一部分講四個問題。

(一)《說苑》的編纂目的。劉向歷事宣、元、成三帝，處於西漢由盛轉衰的時代。漢宣帝雖被後人稱為中興之主，但晚年迷信神仙方術，朝政已趨衰微。宣帝的子孫則更不肖，據史書記載，元帝「優游不斷」（《漢書·元帝紀》），成帝「湛於酒色」（《漢書·成帝紀》），當時，宦官專政，外戚擅權，至劉向晚年，西漢的統治已經岌岌可危了。

劉向身為漢室宗親，秉性鯁直，又富有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和卓越的遠見，面對王室危機，他憂心如焚，直言規勸皇帝，大膽指斥權臣。他對好友陳湯說：「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漢書·楚元王傳》）「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劉向對挽救漢王室，就有這樣一種義不容辭、責無旁貸的責任感，在這種責任感的驅使下，劉向一生，都在與外戚和宦官作鬥爭，都在為匡正皇帝的過失、指引皇帝行正道而努力。

劉向針砭時弊的方法有兩種，一是向皇帝上書，痛切直言；二是通過作文、編書委婉諷諫。《漢書·楚元王傳·劉向》載：「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這段話向我們揭示了劉向編書（包括編《說苑》）的政治目的，從中可以看出，劉向是把《說苑》等書當諫書用的。

(二)《說苑》的命名。劉向《說苑敘錄》云：「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

事類眾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百家，後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這段話的文字可能有闕漏訛誤，但大意是清楚的，它告訴我們，「說苑」這個名稱，在劉向編本書以前就已經有了，它可能是一本書的專稱，也可能是一類書的泛稱；劉向當初給本書起的名字叫《新苑》，與《新序》正好相對。《新苑》後來改為《說苑》，是何人何時所改，詳情雖難考定，但料想距成書的時間不會太長，因為東漢初年的班固著《漢書》，在《藝文志》中所引的即是《說苑》之名，而班固不過比劉向晚出三十多年。

《釋名·釋言語》：「說，述也，宣人意也。」《說文解字·言部》：「說，談說。」「說」就是敘述、談論。古代以「說」命名的篇名和書名，多有廣談諸事的含義，如《韓非子》的《說林》、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等。「苑」本指豢養禽獸、栽種樹木的場所，借以稱聚集之所。本書名《說苑》，顧名思義，即講述的故事彙編。本書收錄的，多是對話故事，以《說苑》命名，倒是名實相符的。

(三) 《說苑》的取材。《說苑》的資料來源，前文所引的《說苑敘錄》已作過交代：是劉向在校書過程中從皇家圖書館所藏的眾多圖書中搜集來的。他對這些資料進行甄別挑選，去掉「淺薄、不中義理」者，去掉「與《新序》復重者」，編成了本書。《說苑》所選用的資料，從時間上看，自上周秦，下迄西漢；從內容上看，有周孔正論，也有百家雜說；從文體上看，有記敘也有議論。這些資料，多數現在還可以見到，有的完整保存在原書之中，有的散見於其他典籍之內。但也有一部分，因原書早已亡佚，其他文獻也不見輯錄，存亡繼絕，只有靠《說苑》一本書了。這些僅此一見的資料，對考古、校勘、輯佚的學者來說，無異於瑰寶，這正是《說苑》至今還能體現的價值之一。

(四) 《說苑》的體例。《說苑》的體例有兩個特點，一是以類相從，二是對應成篇。

以類相從，就是把性質相同或相近的資料編排在一起。《說苑》編成共二十卷，即將資料按內容的

不同分為二十個類別。從前有人說「類事之書，始於《皇覽》」（王應麟《玉海》），其實在魏文帝曹丕編《皇覽》之前，類似編類書的編纂方法已經被人們使用了，本書即是一例。

再說對應成篇。全書凡二十篇，各篇以二字命名，借以概括全篇的大意。從現存各篇的內容和篇名來看，這二十篇多有對應關係。有的體現得十分明顯，如《君道》與《臣術》，《貴德》與《復恩》，《修文》與《反質》等，它們的相對由篇名的字面也可以反映出來。另一些篇章則有內在的對應關係。如《建本》著重講思想修養，《立節》著重講行為準則。《政理》主張施教愛民，《尊賢》提倡禮賢下士——這是為君治國的道理；《正諫》論匡君之過，矯君之失——這是為臣盡忠的本分。《善說》闡述講究「談說之術」的重要意義，《奉使》記載「談說之術」在外交場合的巧妙運用。《權謀》論說如何施權用謀——是方法論；《至公》提倡秉公行事——是人生觀。全書多談文教德化，而《指武》專論刑罰武功。劉向在編纂本書時，不論有意或是無意，把對應的體例，貫穿於內容的歸納和篇目的編次之中。

三、《說苑》的思想內容

《說苑》一書，就思想觀點看，「兼儒墨，合名法」，諸子百家，兼收並蓄；就題材性質看，或取於正經信史，或取於「街談巷議」、「道聽途說」，真偽雜糅，全書介於歷史與小說之間；就內容看，以闡述治國修身的道理為主，兼及天文、地理、名物、制度，堪稱網羅宏富、雜彩紛呈。下面著重從思想觀點方面論述之：

(一) 天道觀方面。《說苑》中既有迷信天命鬼神的成分，也表現了對天命鬼神的懷疑、甚至否定。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這是《周易·繫辭》中的話，《說苑》相信並引用它，認為人的命運由上天決定和顯示，人必須遵照天命行事。《辨物》載有兩個故事，一個故事說秦始皇及二世當政

之時，各種怪異現象相繼出現，「天變動於上，群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國家遂以滅亡。另一個故事說晉平公久病不癒，夢見黃熊入於寢門，恰遇鄭子產來晉國訪問，子產說黃熊可能是大禹之父鯀所變化，於是祭鯀，平公的病五天之內便好了。這兩個故事無非說明，人間的事情，大至國家的興亡，小至個人的禍福，均由鬼神掌管。殷周時代，尊天祀鬼，這種思想對後世影響很大，《說苑》中類似上述的議論和記敘還有不少，正是受這一影響的表現。

以孔子為首的儒家，信天命而遠鬼神。〈辨物〉同時又載有這樣一個故事：子貢問孔子死人是否有知，孔子回答說：「我若說死者有知，恐怕孝子賢孫只注重對死人的安葬祭祀而忽視對活人的奉養；我若說死者無知，又怕不孝子孫將死人棄屍不葬。死者是否有知，死後自然知道，到那時了解此事並不晚。」從孔子模稜兩可的回答中，我們看到了他對鬼神的懷疑。正因有懷疑，所以他反對濫祀鬼神。〈君道〉載：楚昭王有疾，占卜的結果說是黃河之神作祟，楚大夫要用三牲祭河神，被昭王制止了。昭王說：「祭祀不應該超出一定的範圍，江、漢、睢、漳之神我應祭祀，黃河之神卻管不了我。」孔子讚揚昭王的做法，認為他「知天道」。孔子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論語·為政》）楚昭王的故事只不過是孔子觀點在《說苑》中的形象表現。〈反質〉對祭祀作出具體規定：「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這也是從儒家的祭祀制度中抄錄的。

墨家信鬼神而不信天命，但認為鬼神的意志隨人事而變化。〈君道〉載：「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這個卜者簡直就是墨者，這個故事是在為墨家的天道觀作驗證。

法家認為天地有自身的運行規律，人間的一切並無天神地鬼來操縱。這種思想，《說苑》也有所表現。如〈君道〉載：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以為不祥，召晏子而問之。晏子告訴他：國有

三不祥，一是有賢不知，二是知而不用，三是用而不任。山是虎的居室，澤有蛇的洞穴，在這些地方見到虎和蛇，沒有什麼不祥的。晏子的話，重的是人事，否定的是鬼神。

(二)哲學思想方面。《說苑》並沒有專論哲學，但在許多地方體現儒家「中立而不倚」的中庸思想，和道家對立轉化的觀點。《敬慎》載：孔子在參觀周廟時看到敬器，叫子路取水灌入其中，敬器滿則覆，虛則倚，中則正。這敬器又叫座右之器，實際上是中庸之道的實物象徵。中庸是儒家制定禮制的思想基礎，禮制確定之後，反過來規範人的思想言行，使之合於中庸之道。孔子說：「夫禮，所以制中者也。」（《禮記·仲尼燕居》）《說苑》中許多故事，是合禮的，也是合中道的。如《君道》載：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憤憤不平。魯大夫師懼卻說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認為他「死不足惜」。該篇又載：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跳舞時吩咐別人不可違背他的話。師經拿琴撞文侯，打掉了文侯冠上的旒。文侯要殺師經，師經說：只有桀紂才怕人違背他的話，我撞的是桀紂，沒有撞我的君王。文侯放了他，並叫人把琴懸掛在城門上，作自己有過失的見證，不修補冠上的旒，讓自己引為鑑戒。《說苑》還主張人臣盡了勸諫的責任之後，如果君王仍然執迷不悟，人臣可以離他而去；他有難，臣子不必為他而死；他逃亡，臣子不必送行。封建時代的臣子必須效忠君王，但《說苑》告訴人們，對昏暴的君王，可以殺，可以打，也可以棄置不顧。《建本》載：曾參在父親暴怒時硬挺著挨打而不逃走，受到孔子指責。孔子要曾參學習舜對父親的做法：在父親用得著他的時候侍候在身邊，在父親氣得要殺他的時候找不著人，小打挨著，大打走開。封建時代的兒子必須孝順父母，但《說苑》告訴人們，不能孝順得無端送命。提倡盡忠盡孝卻反對愚忠愚孝，宣揚君父尊嚴卻又要君仁父慈，這中間透露出的折衷，正是中庸思想在倫理關係中的反映。中庸用於行為上，就是《敬慎》指出的「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中庸之道是一種妥協哲學，既能維護統治者的統治，對被統治者的利益也有所照顧，所以能在社會上流傳幾千年，

《說苑》的編者也樂於接受和宣揚它。

老子認為事物中包含大小、有無、長短、強弱、生死等對立，這種對立，互有聯繫，又互相轉化。《說苑》多處引用老子名言「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表現了對老子思想的認同和推崇。老子還有個觀點叫做「柔弱勝剛強」。《敬慎》引老子的話說：「人的舌頭之所以長存，是因為柔軟；牙齒之所以脫落，是因為堅硬。草木初生時柔脆，其死時枯槁。柔脆是有生機的表現，剛硬則是死亡的象徵。」這是老子觀點的形象說明。把對立轉化的思想用於權術上，就是老子所說的「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見《老子》三十六章）。《權謀》載：智伯向魏宣子索地，魏宣子不與。宣子的謀臣任增問：「為什麼不與？」宣子說：「他無故索地，所以不與。」任增說：「他無故而索地，我們無故而與之，正好增長他的貪心。他一得意，就會向別國索地，別國不與，他就會攻打別國。」魏宣子給了智伯土地。智伯又向趙氏索求，趙氏不與。智伯惱怒，圍攻趙氏的晉陽，於是韓、魏、趙三家聯合起來反擊智伯，智氏滅亡。任增和魏宣子這種「以退為進」的做法，正是老子哲學的活用。

此外，《說苑》還流露出陰陽五行的思想觀點，如《辨物》中某些對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解釋，就是這種學說的體現。

(三) 政治觀方面。《說苑》兼取道家「無為而治」的主張，強調的卻是禮制和法治。

《君道》一、二兩章，開宗明義，借師曠、尹文之口，說「為君之道」務在「清淨無為」，認為「事寡易從，法省易因」，「聖人寡為而天下理」。黃老之術盛行於西漢初年，《說苑》便反映出這一歷史痕跡。《政理》開頭有這樣的議論：「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又說：「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

強國先其刑而後德。」這兩段話意思大致相同，推崇的是德政教化，同時又主張刑德並用，這是貫穿《說苑》全書的政治思想。

有頭腦的政治家都主張重視人民力量，對人民實行寬緩政策。孔子反對橫徵暴斂，謂「苛政猛如虎」（《禮記·檀弓下》），墨子希望「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墨子·非命下》），孟子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荀子主張「輕田野之賦，平關市之徵」（《荀子·富國》）。《說苑》搜集了許多類似的議論，表明了編者崇尚王道、德政的政治傾向。《政理》載：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說「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問這話是什麼意思，孔子說：「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哀公說這樣我就貧了，孔子說：「君王是百姓的父母，哪有子女富有而父母貧窮的呢？」該篇又載：武王問呂望如何治國，呂望說：「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武王又問如何愛民，呂望說：「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又進一步解釋說：「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主張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建本》還載有這樣一個故事：齊桓公問管仲「王者何貴」，管仲說「貴天」。桓公仰視天，管仲說：「我說的『天』，並非蒼蒼莽莽之天，人君應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疆，非之則危，背之則亡。」管仲的話把人民的重大作用和統治者對人民應採取的態度講得很清楚了。

儒家重教化，《說苑》也作了宣揚。《君道》載：帝舜時，有苗氏倚仗天險不肯歸服。禹要出兵討伐，帝舜不許，說教化還未對他們起作用。後來長時間教育感化，有苗氏請服。天下人知道後，「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這是將教化與武力對舉，肯定的是教化。《政理》載：魯國有父子相訟，季康子認為違背倫理，要殺那兒子。孔子卻說：「因為統治者缺少教誨，老百姓不知道父子打官司是錯誤的已經很久了，不教而誅，是殘殺無辜。」在孔子的教導下，那對父子撤除了訴訟。這是將教化與刑罰對舉，肯定

的也是教化。當然，《說苑》也並非反對一切武力和刑罰，它主張的是先德教而後刑罰。

法家主張以法治天下。他們認為，作為君王，不僅要主持制定法令制度，還要掌握一定的權勢和駕馭臣下的方法，否則法令難以貫徹執行。《說苑》是贊同這主張的。《君道》說：「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這是從理論上強調權勢的重要。又在《指武》舉例說明這一問題，該篇以五帝三王與孔子作對比，說他們都推行仁義，五帝三王行得通，孔子卻行不通。為什麼？就因為五帝三王有官爵獎賞好人，有武力懲罰惡人，重賞嚴刑同時施用，天下人就會按照他們所要求的去做。而孔子認為他的弟子顏回很好卻無法賞他，認為一個叫孺悲的人很壞卻無法罰他，連獎懲一個人的權力也沒有，世人誰會聽他的？於是得出結論：「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這法、術、勢三者並重的原則，就是專制君王治國的法寶。

法家「有功必賞，有罪必罰」的主張在《說苑》中也有體現。《復恩》說：「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縣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這是以買賣關係比喻君臣之間爵祿授受關係，從而說明君王行賞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有賞必有罰，賞罰均要恰當。《復恩》載：趙襄子在晉陽解圍後，重賞了並無大功的高赫，有大功的人不服，趙襄子說：「在危難中不失君臣之禮的唯有高赫，你們卻傲慢待我，我當然重賞他。」孔子贊成趙襄子的做法，認為他賞了一人，而使天下人臣不敢失君臣之禮。這是說君王為鞏固和加強自己的地位和威望而行賞。該篇又載：晉文公返國後，對隨他出亡的人員分三等進行賞賜：以仁義培養他德性的人為上賞，匡正他過失的人為次賞，出苦力的人為再次賞。周內史稱讚他的「先德後力」，預言他能成就霸業。這是講利用賞賜為政治目的和主張服務。《尊賢》載：諸侯舉兵伐齊，齊君求群臣為他出主意。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對齊君的多次問話不作回答。齊君大怒，以為受到戲弄。淳于髡說：「我不敢戲弄你，我笑的是我的鄰人。鄰人用一碗飯、一壺酒、三尾鯽魚向鬼神祈禱，要鬼神讓他最差的田地也收最多的糧食，並保佑後世洋洋有餘。我笑他貢獻少而索取多。」於是齊君立淳于髡為上卿，

賜金千斤，革車百乘。淳于髡為齊君平了諸侯之難。這說明要人辦大事就必須用重賞。〈至公〉載：楚文王的兩個王子在出兵伐鄧的途中搶了一個老人裝菜的畚箕，文王為了禁止暴行，教育後代，不因私愛兒子而拋棄法令，終於將二王子斬首以謝老人。這故事不一定真實，但意在說明，為了政治需要，有時對最親的人也不得不行重罰。

節用節葬既是墨家的主張，也是其他各家所提倡的社會風氣。《說苑》對此的宣傳隨處可見，〈反質〉力戒侈靡，載楊王孫裸葬矯俗的故事，說明費財厚葬對死者無益，對生者有害，是極端愚昧的做法。值得肯定的是，《說苑》常把作風的奢儉，提到國家興亡、人生禍福的高度來認識，向人們指出了成由勤儉敗由奢的道理。

廣開言路是《說苑》反覆強調的一條安邦治國的重要措施。書中除了不厭其煩地說明兼聽則明、偏聽則闇的道理外，還指出為君上者在廣收博採的同時，還要善於取捨和決斷，因為獨斷專行和優柔寡斷都可能傷身誤國。

舉賢任能是《說苑》議論最多的問題，除〈尊賢〉專題論述外，其他各篇幾乎都有所涉及。這一是因為使用賢能對治理國家確實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二是因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士人為千求利祿，自然竭力向各國君王和大臣宣揚士人的作用，《說苑》輯錄士人的言行，也就把這一現象反映出來。其中有些議論比較精彩，如〈尊賢〉說：「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絕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用比喻手法說明治國必須任賢的道理。此外，書中還列舉出許多招納和使用賢能的方法，如〈尊賢〉載：商湯用有莘氏之媵臣伊尹為三公，天下平治；齊桓公以城陰之狗盜管仲為仲父，稱霸諸侯；秦穆公用五羊皮買百里奚於道，吞併西戎；周文王得老而且賤的姜子牙，滅殷興周。從而說明民無終賤，應該唯賢是舉，不必講究出身。該篇又載：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帶著禮物以師禮求見的士人有十二位，主動前往拜會的窮巷白屋之士有四十九位，